

#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 ——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体会

王洪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召开的一次极重要会议，也是我国进入向四个现代化和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目标进军的一次关键会议。这次会议，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二十年中积累的许多问题。会议深入批判并坚决纠正了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同时也基本上纠正了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左”倾路线错误，初步清算了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以来犯的某些严重左倾错误和路线错误。经过三中全会，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都发生了根本转变，牢固地转上了马克思主义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史上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有某种相似的重要历史地位。

下面谈两个问题：

一、会议的简要情况。

二、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及其重大意义。

### 一、会议的简要情况

三中全会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召开的。这两年形势的特点是，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基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开始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二、着手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卫生等事业，初步把各项工作纳入有秩序发展的轨道，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第三、从一九七八年五月起，在报刊上、理论界和领导层，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进行了两条思想路线的交锋。从这几方面看，两年来党的各项工作，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基础上，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向“四化”进军打下了初步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这两年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问题是党内有些领导人，受毛泽东同志的“左”倾路线影响较深，在新时期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理论、路线和政策，阻碍全党为纠正过去错误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以致使党的路线没能从根本上全面转到马克思主义轨道。这就造成党的工作的某种徘徊和前进不快的局面，甚至发生一些新的失误。其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重新确定了“四化”的目标（这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沿袭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党的基本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提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理论和路线延续下来，妨碍人们纠正过去的“左”倾路线错误，并导致思想混乱和工作摇摆不前。在经济建设上，重犯了高指标、新冒进的“左”倾错误。加重了因过去工作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破坏已经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了大幅度的财政赤字。一九七八年二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不切实际地提出一九八五年钢搞到六千万吨，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等大计划。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积累率一九七八年高达36%。这些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大计划的实施，加重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也增加了国家财政赤字。在思想上，这些同志以“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干扰党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不但继续宣扬神化领袖的旧的个人迷信，还制造新的个人迷信。在组织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仍有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被某些领导人压下来；特别涉及一些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动，许多重要领导人不能重新出来工作。这一切，都严重阻碍着党纠正过去错误和向“四化”进军的前进步伐。

这样，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一方面党需要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在实现这一伟大转变时，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同时也要突破那些坚持过去错误路线同志所设置的禁区，认真清理党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犯的严重“左”倾错误（包括五八年到六〇年的路线错误）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左”倾路线错误。这样才能吸取宝贵的历史经验，保证党在实现新时期的伟大任务时，路线正确，不重犯过去的错误，步入胜利之途。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三中全会召开前，先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时三十六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正式开三中全会，十二月二十二日结束，共开了五天。三中全会以后又开了一天政治局会议。三个会议加在一起近一个半月，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开得最长的会议。研究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把三次会议结合起来去领会，三中全会公报就包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首先由华国锋同志致开幕词，提出来要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许多同志热烈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但也有一些同志提出，与此相应，还要解决一些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时说，为了搞好工作重心转移，应当解决“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讲到“61人叛徒集团”、“天安门事件”、康生、谢富治错误等六个问题，提请中央决定。陈云同志说，我很担心这些问题不解决，能不能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

能不能同心同德搞“四化”。陈云同志发言的简报出来以后，大家一致拥护。接着在继续讨论中又提出彭德怀同志问题，“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问题。大家认为，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主持工作时搞得很好，人们说“毛主席的路线又回来了，根本不是什么右倾翻案风”。这样，中央常委决定，会议就这么开起来。从中央工作会议到三中全会，都是放手让大家讲话，包括批评中央工作的各种意见，对历史问题的各种意见。大家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路线是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指名道姓的。根据胡耀邦同志的传达，两次会议大家都抢着讲话，绝大部分没有什么稿子，放开讲，发言自己负责，定稿就登简报。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也有些人写了稿子，写了一本本。两个会，产生了三中全会公报，华主席和叶、邓、陈副主席的八个讲话，一九七九到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件，还产生了登载五百多份发言的简报。由于简报上的发言，中央都没有核对过，不便于提供给我们研究（我自己也只是听到耀邦同志传达说有这些简报，并没有看过），所以我仅就三中全会公报和华主席、叶、邓、陈副主席的八个讲话，以及两个农业文件、一个计划文件，谈一下从党史的角度看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及其意义。

## 二、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及其重大意义

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包括很多方面，这里仅就自己的学习体会，谈以下几点：

### （一）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决定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并且阐明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三中全会完成了这个任务。三中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会议在作出这一决策时全面回顾了从建国开始，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把工作重心向着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转移的情况，肯定了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指出，由于我们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工作指导上曾发生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尤其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妨碍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特别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打断了。这样，在新的形势下，及时地果断地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

然后，全会又分析了重点转移与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关系以及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内容。会议认为，决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实施新时期总任务的重大步骤。党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是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它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

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地革命。我国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但是，“大规模地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不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就会落空。全会还指出，“党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三中全会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对新时期总任务的规定，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它标志着党在政治路线方面已经根本上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牢固地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八大”时期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为什么说三中全会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对新时期总任务的规定，是从根本上使党的政治路线转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呢？

第一，三中全会的决策和规定，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要求，符合我国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任务的论述就讲到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曾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夺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2页）马恩这段论述，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任务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内容：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在我国一九四九年已经解决了。二是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权，剥夺剥夺者。在我国，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完成了。三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我国一九五六年已经提出，没能很好实现，而成为当前最紧迫，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任务。

列宁在1918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也提到：“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了，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列宁在这里强调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解决以后，就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党的工作的“首要地位”，并且要把它作为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来看待。

斯大林一九三九年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也指出：“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防。”斯大林虽然在实践上犯过肃反扩大的错误，但他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的论述是正确的。

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尤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和发展经济，繁荣和提高文化，“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论断，构成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重要观点，而这恰恰是过去被我们长期忽视的观点。实践证明：这些正确观点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这些论断，来确定自己政治路线的。

三中全会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和新时期总任务的规定，也符合我国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三中全会的上述决策和规定，是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二十多年的条件下作出的。这时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早已经不存在了。广大人民同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残余形态。整个来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显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和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正是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而采取的政治路线。这里举几个数字加以说明：1948年毛泽东同志曾估计我国有3600万地富分子，二十年来地富分子死了不少，现在还存在的地富分子（指摘帽以前）约有四百万。经过评议，绝大多数地富分子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因而继续戴帽的不到五万人。这五万人分散在具有八亿人口的农村。有的县，这次评议后继续戴帽的分子是原来地富分子的千分之一。民族资本家在一九五六年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时候，全国工商业者是七十一万，加上私方代理人五万，一共七十六万人。二十多年死了一部分，退休了一部分，当时把有些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也划了进去，现在落实政策又划了出来。结果，现在全国企业、商店里担任工作的原资本家约有十多万人。那么这些人的工作情况怎样？据上海、无锡、天津部分企业的调查：在这部分企业里一共有原资本家六千一百三十五人，其中有二百九十八人退休，剩余参加车间、商店劳动的原资本家有五千三百七十七人，工程技术人员有十九人，一般科室管理人员有四百三十四人，担任车间主任的七人，担任厂长、经理的没有。这个状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工资状况如何？根据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个城市的统计：现有的原资本家，工资在五十元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工资在五十元至一百元的占百分之五十八，两项加起来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三；工资在一百元至二百元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七，二百元至三百元的占百分之二点三，三百元以上的占百分之零点七。这个工资收入和我们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收入差不多。从这里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资本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绝大多数已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阶级关系的现状，正是三中全会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依据。实际上这种类似的阶级关系状况早已出现了，由于过去工作上的失误才推迟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干扰了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以上是说，三中全会制订的政治路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的理由。

第二，三中全会的决策和规定，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错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

前面我们谈到，从建国以来，党的事业经历了成功和失误的曲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逐步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说，截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在近三十年中，虽然大部分时间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一部分时间犯了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就犯了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三中全会在清算“文化大革命”错误中，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澄清了过去被错误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颠倒了的是非。其中包括：所谓一月风暴，所谓二月逆流，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对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工作的评价等等。会议对这一系列大是大非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的否定。会议讨论中还认为，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也不可靠，但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要有一个过程。尽管三中全会还没能象四中全会那样，从几方面概括出“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错误，但是只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在思想上是明确的。

三中全会还对党内生活中因五七年以后的严重左倾错误而积累的许多问题，尽可能做了纠正和解决。其中纠正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错误和对彭德怀同志问题的平反，是个很大的，带有路线性的拨乱反正。

三中全会不但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是非，而且深入到五八年下半年到六〇年这一段，加深对它的全局性左倾错误的认识，就促使党的政治路线更为彻底地转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

我们说，到了三中全会才使党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转到正确轨道，还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限于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党内某些同志总想循着过去的错误路线走的干扰，因而对于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未能深刻认识和加以纠正。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就其部署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重新确定“四化”的基本目标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会议通过的文件，在路线上仍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仍旧作为基本内容，甚至还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变化。由于有了前两年拨乱反正的基础，人们对过去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入了。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党和人民痛定思痛，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竟能篡夺这样的高位，横行无忌，造成国家的莫大灾难呢？党和毛泽东同志有什么重大失误被他们利用了呢？这种冷静的思考和总结，推动人们对过去的理论和路线重新进行审查。三中全会在热烈而充分的民主气氛下，找到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和“左”倾路线错误，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被颠倒了的大是大非，还解决了近二十年积累的问题，因而能够重新明确地确立党的正确政治路线。

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政治路线，在拨乱反正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纠正了延续多年的“左”的形势分析，重新肯定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全党的工作重点必须及时地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2) 重申了党的“十一大”已经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今后长期的中心任务，除非有大规模外敌入侵，绝不能干扰这个中心任务，并且取消了十一大还沿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等错误提法。同时，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那种认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革命的观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3) 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把这些思想概括到党的政治内容中去。”

(4) 三中全会还强调了民主化和繁荣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包孕了后来提出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初步思想。

当然，三中全会还只是从根本上使党的政治路线转上正确的轨道，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完善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才逐步完成的。可是三中全会实现政治路线上的根本转变，不是个简单的事。要使全党全国人民从多年来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转到今后主要讲经济建设，讲“四化”，讲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这种主攻方向的转变，不但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变，也是人们头脑中的重要思想转变。

## (二) 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

三中全会把党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也需要把党的思想路线转到正确轨道，因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三中全会正是这样做的。

“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只有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立场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全会批判了汪东兴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论调，指出“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状态是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现代迷信，把人们思想禁锢在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圈子里的一定条件下形成的。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把思想路线能否正确解决，提到党和国家存亡的高度。

三中全会的上述决定和论断，标志着党的思想路线已经从根本上转到正确轨道。为

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全会纠正了党在过去工作中背离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错误，彻底否定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批判了他们鼓吹的“现代迷信”。

如前所述，我们党自建国以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遭受过两次严重的挫折，这是同党的思想路线的曲折分不开的。从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的胜利年月，党基本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谦虚谨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但是，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没能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三大改造后期，主观主义成分就多了，至于一九五八年到六〇年那次左倾路线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路线错误，其思想根源则是背离了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五八年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主观制造敌情，根本脱离了我党的基本实际。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动乱，则由于党、主要是毛泽东同志主观主义的形势估计，空前严重地制造和夸大敌情，并形成了一套主观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恶果。三中全会勇敢地清理过去这些错误，实事求是地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平反，为一九七五年因努力恢复党的正确路线而遭到诬陷的邓小平同志恢复名誉，就是对过去那些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否定。

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发生的这种思想路上的错误，后来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所利用，推到极端，制造了一种“现代迷信”。别有用心地把毛泽东同志做的每一件事，在文件上划的每一个圈，所说的每一句话，写在纸上的每一个提法，都当作最终的绝对真理，而不受实践结果的检验，成了新的“教义”。说什么不论符合不符合客观实际，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他们那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他们用这一手，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作为进行阴险无比的罪恶活动的保护伞。我们确实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人物，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决不是至高无上的天神，他也会犯错误。他说和做得对的，我们就坚持；不对的，我们就改正。毛泽东同志对林彪讲的“四个伟大”也感到讨嫌，说明老人家有时对他们搞的这一套也反感。把领袖神化，在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造成只有一个人动脑筋，其他人都听命的局面，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新经学”，严重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活力。这种思想僵化的状态，不但使我们的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许多事物丧失了识别能力，而且使我们的许多人对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长期肆虐也丧失了判断能力和斗争能力，这是他们得以长期横行而不能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三中全会总结历史上这一沉痛教训，在保护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的前提下，深刻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现代迷信”的阴谋，批判了他们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给全党恢复毛泽东所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以新的活力。这是恢复正确思想路线的一个方面，批判了林彪等人制造的“现代迷信”。

第二、全会批判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度流毒甚广的“两个凡是”的谬论，指

出“凡是”论实质上是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继续，从而否定了“两个凡是”，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兴高采烈地认为，造成我们国家许多灾难的祸根已经拔掉了，各方面的工作按道理应该发展的很顺利。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要想贯彻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决策，都会遇到阻力。当时，一般干部和群众比较关心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邓小平同志能不能出来工作？二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究竟应当怎样估计？三是这些年来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确实搞了一大批错案，这些冤假错案能不能平反？（现在才知道牵连一亿人口）一般人的想法，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然而，实际上解决起来却相当困难。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些重大是非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的斗争。正值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大力进行拨乱反正的年月，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是李鑫同志组织起草的，汪东兴同志审定并批准发两报一刊社论。六日广播，七日见报。社论发表以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许多同志说，坚持“两个凡是”，直接目的就是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是阻止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凡是”与林彪的“顶峰论”是同一个思想体系，实际上就是“按既定方针办”。

四月十日，邓小平同志在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中说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五月三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小平同志的信，肯定了小平同志的提法。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王震同志和邓力群同志一道去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曾来看过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主席讲，一个人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都改得乱七八糟呢？就是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所以要改嘛。”……小平同志接着又说：“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象主席这样。马恩没有说过两个‘凡是’，列斯没有说过两个‘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两个‘凡是’。我对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说，我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同林彪做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思想体系看待。”

我们开始看到“准确的完整的”这个提法的时候，觉得很好，但不知道是针对“两个凡是”的。现在看来很清楚，正是小平同志这个提法，开始澄清“两个凡是”在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混乱。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而且毛主席有时情况不明，在连话都不能说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怎么能沿用不变？这场争论是汪东兴等人挑起来的。真正拥护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当然不能对他们挑起的争论置若罔闻。“准确的完整的”提法一出来，就给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提供了思想武器。这场争论越到后来，越在各方面展开，它的性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一九七七年七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小平同志复职。华国锋、邓小平同志在会上都讲到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党的十一大文件和华国锋同志讲话，又重申了这一精神。小平同志原先准备在党的十一大作个发言，针对“两个凡是”讲讲党的作风问题，第一位的是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凡是”所以错误，就在于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胡乔木同志按照小平同志讲的意思，起草了一个稿子。因为小平同志致闭幕词，这个稿子就作为聂荣臻同志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章，登在《红旗》杂志上。

一九七七年九月《人民日报》发表陈云同志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写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重要文章。陈云同志写道：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同时，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同志又一次讲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叶剑英同志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作者是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同志。原稿经《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修改后，又送中央党校的同志修改过。这篇文章竟受到汪东兴同志的责难。

在党中央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已经采纳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倡导实事求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形势下，汪东兴同志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并且在一个小组会上专门点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名，说“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在他的鼓动下，一些同志竟然以“砍旗”、“犯了方向错误”等帽子，围剿这篇观点正确的文章。

同年七月，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针锋相对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正确的。九月间，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视察工作，又一次阐述理论要同实际结合，批评一些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坚持实践标准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彼此对立的观点多次较量之后，在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恪守“两个凡是”论的同志们仍然挑起争论。他们说，在报刊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有意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影响安定团结。争论一起，他们的错误观点就遭到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激烈批评。与会者认为，这几位同志代表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潮，根本违背毛主席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只能按领袖的话去讲问题去办事，有些过时的甚至错误的东西也要沿用，那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华国锋同志说到：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上，曾专门讲过“凡是毛主席作过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现在看来，

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这“两个凡是”的提法，虽然同《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说法不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应做自我批评。在会议的这种形势下，汪东兴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才做了《我的初步检讨》。会议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胜利而告终。

这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胜利，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胜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时期，从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那一次思想解放，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延安整风，从把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和神圣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更好结合，带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胜利。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从真理标准讨论到三中全会这次。这是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和汪东兴同志炮制的“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它必将促进我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夺取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胜利。

三中全会，不但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而且在指出任何一位领袖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对我党和我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这样，三中全会就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及其有关问题。

(三)规定了正确的计划方针，制订了解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使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

三中全会规定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同心同德搞“四化”，那么为了落实这个任务，就要扎扎实实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因而，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

全会认为，制订经济规划应坚持既有雄心壮志，又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方针，不能单凭良好的愿望，急于求成。与会者说，提到会议上的工业方面的两年规划，方向是对头的，雄心壮志是好的。但是，在经济工作方面存在的矛盾暴露得不够，没有把问题揭露出来，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解决，生产是搞不上去的。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呢？会议讨论的意见，可以概括成这么几条：第一是工业同农业的比例关系失调。第二是基本建设同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同发挥现有工业生产潜力这个比例关系也失调。第三是先行工业没有先行。工业上的粮食、煤、电、原料工业没能优先发展，不够吃；交通运输一直紧张。第四是管理体制上弊病很多。权力过于集中；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以党代政，以政代企；机构臃肿，责任不明，办事踢皮球。

三中全会的功绩之一是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提出必须立即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调问题，同时要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克服上述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普遍地蓬勃勃勃地发展起来。鉴于提到会议的两个经济规划安排不够理想，全会建议经国务院修改后，再提交七九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央下决心要在七九年夏天全面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正是在三中全会这一精神指引

下，七九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折点。

为了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三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制定了两个农业文件。三中全会关于农业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到严重破坏。农业搞不上去，粮食不够吃，林牧副渔等得不到很好发展，半个现代化也实现不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过去农业的发展情况，指出了取得的成绩，同时承认近二十年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出现过两个马鞍形：一九五八年到六二年是一个马鞍形，“文化大革命”十年又是一个马鞍形。要讲真话，不是什么十三年连续大丰收、十五年连续大丰收。只有实事求是地揭露存在的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想方设法地把农业搞上去。会议提出把农业搞上去的二十五条措施，主要体现在《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文件强调头几年关键是纠正农业方面的“左”倾错误政策，全面落实党的正确农业政策，把国家、集体、个人这三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在经济上必须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提出了一系列当前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会议批判了过去的一些“左”倾错误提法和做法，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呀”，“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啦”，把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出路带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去堵，多种经营的路都堵死了，结果是大家穷得要死。会议认为，只有全面落实党的农业政策，把农村经济繁荣起来，才谈得上农业现代化。

会议制订的农业上的两个文件，打中了农村工作的要害，两个文件的贯彻，使农村普遍出现了繁荣景象。这就说明了农业文件的正确性。

#### （四）三中全会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就着手解决组织方面的问题。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把他们篡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大一部分权利重新夺回来，交给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所信赖的同志手里，就是一次重要的解决。但是组织上还存在着“四人帮”横行时期遗留的很多问题。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实际涉及到由执行什么路线的干部来掌握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因此，重要的干部职务调整是势在必行的，也是与会者和广大党员的强烈要求。

三中全会适应这种形势，为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决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措施。过去，七大以前有过，有采取这种措施的先例。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并选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还选举了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三中全会结束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解决组织问题的继续，政治局会议除了讨论

决定新增加同志的分工，还讨论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第一，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确定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辞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确定胡乔木同志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同志不再兼毛著编委会的职务了。确定中央第二位副秘书长是姚依林同志，他还兼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也就再不兼任办公厅主任了。确定宋任穷同志为中央组织部长，张平化同志调到中央党校当副校长，后又调任农委副主任，建议调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当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会议还确定冯文彬同志兼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中同志（原在周总理身边，是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后被“四人帮”排挤走了）调回中央当办公厅警卫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对中央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很多意见，政治局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才重新做了这些安排。汪东兴同志原来身兼九职：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办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办公室主任、“毛办”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一个人集中了这么多重要权力是很不合适的。这次把许多兼职减下来了。三中全会对汪东兴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又犯了新的错误的同志，主要不是算多少年前的老帐，而是着眼于现在，既看到他们犯的严重错误，又看到他们曾经做过的有益工作，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没有采取过火斗争和过分处理的错误做法。这表明，三中全会在党内斗争上已经恢复了我党的正确传统。

总括以上四个方面，三中全会在我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重要时刻，在政治上纠正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以后的工作中曾经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错误，在经济上改正了急躁冒进，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在思想上扭转了唯心主义横行的局面，在组织上抛弃了“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从而根本上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错误，使党的各项工作开始牢固地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次会议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是因为我党有历史上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的经验，有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拨乱反正是政治、思想准备，而最主要的还是会议发扬了延安整风精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恢复和发展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从而依靠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正确地解决了新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会的同志说：“这是延安整风以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或说是“建国以来开得最有成效的一次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什么重大历史意义？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就是经过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纠正了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左”倾路线错误，同时也初步认识了58年到60年那段“左”倾路线错误，使党的路线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这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保证。这个问题不解决，要想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了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又有新的发展，我们就信心百倍。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三中全会理论意义在于，经过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和今年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恢复

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上，又大踏步前进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根本谈不上毛泽东思想发展，那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遭到空前践踏和歪曲阶段，把毛泽东思想科学的基本观点搞得面貌全非。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四年，其特点是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则是大力恢复被践踏了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实践中有所丰富和发展。这一段，我们党“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查；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上，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符合客观实际新论断、新决策”（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这种理论观点上的恢复和发展就我们经常接触到，可以归结这么几点：

一是在形势分析和对主要矛盾的论述上，恢复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个理论问题不可轻视，它是我们党提出任务，制定路线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近二十多年，我们的许多失误与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偏差有关系。

二是党的中心任务确定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明确了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并把它作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条件。

三是不但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我们近几十年的基本目标，还把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作为基本目标，这对于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四是在思想路线上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头等地位，发挥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基本思想，一扫近二十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唯心主义的流毒，打开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宝库。

五是在组织上实行集体接班否定个人接班，废除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在国际共运史上，没有先例；在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前提下，推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反映新形势下的需要，都有理论意义。

六是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克服权力过分集中，根治官僚主义、家长制、特殊化等弊端，纠正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在基层，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等等。在中央，前几天廖盖隆同志讲到，党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全国人代会分成两个院“区域院”、“社会院”，都是改革中的新事物。社会主义民主的多样化形式，是防止和纠正错误、防止社会主义异化变质的一种很好的探索。这些都是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先声。它说明党的政治路线规定的高度民主，不是一句空话。

理论上的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还有许多新内容。这里只有挂一漏万的提几点。

以上是讲三中全会的路线根本转变所带来的新发展，也是三中全会的意义。

三中全会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也会有不足。我看有两点：第一、对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新冒进，虽然看到了，但对其后果认识还不深刻，对造成新冒进的“左”的指导思

想批判不力。会后虽在79年5月明确地提出新八字方针，由于左的思潮批判不力，调整工作遇到的阻力很大，有时调整不下去。第二、三中全会实行路线和工作重点的根本转变，非常正确。但会内精神与会外宣传结合不够。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之后，没能象对待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样，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因而影响到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政策的更好贯彻。后来采取的许多重大措施，如大力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臭老九”帽子，对57年错划的右派予以平反，对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其帽子等等，都是正确的。那是按照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因过去左倾错误而遗留的问题。可是，一些同志竟转不过弯来。由于长年流毒全党的“左”倾思潮……没有很好的清算，以致有些同志往往把中央提出的符合客观事实的方针、政策，看成是右了、“修”了，而把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一些过左的方针、政策，看成是“革命”的，影响这些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政策的积极贯彻。所谓思想僵化、半僵化，就是僵在近二十多年某些左的口号、方针、政策上，僵在客观实际已经向前发展，思想还停在旧的认识上，这些需要党的强大的宣传教育工作来解决的。三中全会在这一点是有缺陷的。

综合以上，三中全会在党史上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我们党史专业工作者，有义务研究和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党的正确路线更能广泛深入地掌握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其变成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巨大的物质力量。